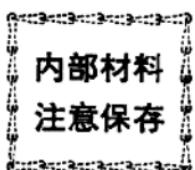


内部材料
注意保存

苏修反华历史文章





苏修反华历史文章

出 版 说 明

为供批判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需要，现将最近两年苏修报刊、电台所发表的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问题上攻击、污蔑我国，歪曲和篡改历史的反动文章汇印一辑，内部发行。由于时间仓促，收集的文章不够完全，译文也未能仔细校勘。批判引用时，请核对原文，出处请注原载报刊。本书系内部材料，请各单位注意保存。

一九七三年七月

苏 修 反 华 历 史 文 章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1974年2月出版

书号 11002·439 定价 0.62 元

(内 部 发 行)

目 录

阿穆尔河流域的古代遗迹说明了什么.....	(1)
远东考古的新发现阿·巴·奥克拉德尼科夫	(8)
论俄中边界形成史	
.....别斯克罗夫内、谢·齐赫文斯基、弗·赫沃斯托夫	(39)
证实真相的文件——摘自俄中关系史卡皮查	(61)
帕米尔各族人民历史点滴(摘要)伊斯坎达罗夫	(67)
十八世纪下半叶清帝国入侵中亚和俄国的政策.....吉列维奇	(74)
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一书的《编者的话》和关于俄中关系部分摘译	(93)
第一个平等协定——纪念苏中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签订四十九周年阿列克谢耶夫	(129)
北京怎样伪造历史尼古拉耶夫	(132)
研究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七〇年苏中关系的新步骤科瓦廖夫	(144)
* * *	
为北京的大国主义阴谋效劳的假历史阿斯塔菲耶夫、纳罗奇尼茨基	(157)
毛分子的世界史概念和东方各国人民的真实历史别列柳勃斯基	(171)

- 关于中国领导违反列宁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的
谈话 阿列克谢耶夫(184)
- 列宁论当代帝国主义矛盾及其发展的
学说(摘要) 普列特涅夫(186)
- 北京的“世界战略”后面掩盖着什么(摘要) 雷巴科夫(190)
- 在毛主义哈哈镜里反映出的世
界史 茹科夫、克里夫佐夫、费托夫(193)

阿穆尔河流域的古代遗迹 说明了什么

在我们的国土上有这样一些地方，它好象古代史籍一样，向人们讲述人类“童年”的历史，因为古代的遗存象路标那样，表明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复杂的发展道路。

由于我们的考古学家多年的工作，苏联阿穆尔河流域已成为这样的地区之一。这里，在阿穆尔河两岸，由于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属于人类最早期发展阶段的出色的遗存。它们确切地证明，早在远古时代，苏联远东地区现代土著民族的直接祖先就住在该河流域。

近年来苏联阿穆尔河流域的考古发现，大部分是同著名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史学语文学与哲学研究所所长——阿列克赛·巴甫洛维奇·奥克拉德尼科夫院士的名字相联系的。不久前《新时代》的记者弗拉基米尔·特里佛诺夫到了新西伯利亚。他在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科学城遇见了阿·巴·奥克拉德尼科夫，并同他进行了交谈。

“阿列克赛·巴甫洛维奇，多年来您在阿穆尔河流域和我国远东地区全境系统地从事考古发掘。请谈谈这个地区最有趣的发现及其科学意义吧。”

“远东地区早就引起了对该边区语言不同的许多族群的历史问题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的注意。

“在这方面，考古学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为远东地区绝大多数民族根本没有他们自己以文字记载的历史。考古遗存实质上

是研究远东地区民族史的唯一资料，并且是可靠的、完全准确的资料。因为这种资料属于某一具体的时期，后来没有被人歪曲过，而文字史料（例如编年史）却往往相反。

“远东地区，尤其是阿穆尔河流域的发掘，已经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关于该地区远古民族史的重要资料。但是可以大胆地说，远东地区早期历史的研究进程越是向前扩展，这段历史就越是引起研究人员和广大读者的注意，而围绕着苏联远东地区及其相邻的东亚、中亚各国民族史主要问题的讨论也就越是热烈。

“最紧张的研究工作是在远东地区南部，即阿穆尔河流域、乌苏里江流域和滨海地区进行的。

“根据该地区考古发掘可以得出的主要结论是，阿穆尔河下游的古代文化有其鲜明的特点。还有一个结论也很重要，那就是阿穆尔河下游的远古文化，即新石器时代文化，同阿穆尔河诸民族——那乃族、尼夫赫族和乌里奇族的现代文化有着最密切的联系。从这里自然得出一个结论：这些民族的祖先许多千年之前就生活在本地；他们创造了高度的文化，这些文化较之当时东亚和中亚诸民族的著名文化毫不逊色”。

“请您谈得详细一点，这些对远东地区民族史极其重要的结论是以什么为根据的？”

“新石器时代远东地区居民的生活情景，大概以艺术遗存反映得最清楚。阿穆尔河下游定居渔人的新石器时代艺术是如此鲜明而独特，它在全世界新石器时代艺术史的背景上描绘了杰出的景象。阿穆尔河⁴下游和乌苏里江沿岸的古代穴室出土的土穴居民的艺术作品，特别是带有纹饰的陶器，给人以难忘的印象。这些陶器的纹饰不是常见于森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简单的窝纹和刻纹，而是精致而讲究的曲线纹饰，有奇妙地交织起来的螺旋纹，甚至还有象古希腊或古罗马时代那样的几何图案呢！

“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沿岸的崖画（峭壁上的雕刻）在亚洲大陆古代居民的艺术创造史上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以情节之丰富、形象之多样而论，萨卡奇——阿良地方的崖画尤为出色。

“以上所述足以说明，阿穆尔河流域新石器时期的社会是相当发达的。现在已经毫无疑问，在远东地区，五、六千年前就存在在当时来说完全是独立而兴旺的艺术文化发源地。就其创作能力而言，就情节和形象的独特而言，阿穆尔河流域诸民族的新石器时代艺术并不亚于与之同时期的任何一个艺术中心。不仅如此，同它们比较起来，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沿岸的雕刻匠人和装饰匠人的技巧更显得远为自由，更富有创造性的幻想。

“应当指出，对造象的比较研究表明，这种艺术是在阿穆尔河畔本地产生的，它有其自己的源流，而不是别的部落传进来的。

“在亚洲大陆的边远地区发现新石器时代阿穆尔河流域诸部落的丰富的艺术，这件事就已经不能不使人惊奇。但更为惊人的是另一个事实，即这个地区的古代和现代民间艺术的相似性。

“现在我们已可以十分确切地查明，新石器时代阿穆尔河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居民的文化不是同别的某一种文化相符，而恰恰是和尼夫赫、那乃以及乌里奇等民族的现代文化相吻合。这些相同点包括这些地区人们的全部生活方式（定居，以捕鱼为居民主要生业）。但最明显的是精神文化方面，尤其是艺术方面的相同点。

“因此，通过对阿穆尔河流域古代遗存的研究，便必然得出一个结论：苏联远东地区各民族的独特文化溯源于远古时代。阿穆尔河流域的土著民族及其文化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柢。他们直接继承了由其祖先创造的高度艺术文化和这种文化的出色的遗存。

“多年来在阿穆尔河上游和中游，从斯烈甸斯克到勃拉戈维申斯克，以至沿着通往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的方向，也进行了广泛的

考古发掘。在滨海边区的范围内展开了对考古遗存的系统研究。这里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属于人类最初期的事实，即人类在远东地区的土地上最初的足迹。现在我们握有十分值得注意的阿穆尔河中游旧石器时代遗存，这里发现了远东地区的整整一个新的下旧石器时代文化区，它的特点是使用石器时代初期技术阶段的砾岩工具。

“这些出土物不仅对远东地区，而且对相邻的亚洲各地都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以新的角度反映了现代人的祖先对亚洲内地和东部边境的最初开拓过程。

“人类的伟大形成过程及其对地球的最初开发，这在东方并不只限于中国，而且也包括几十万年之前即在下旧石器时代就已经不再是荒无人迹的一些地区。

“根据最新的科学发现，那种把民族分为‘有史’民族和‘史外’民族的旧观点，那种以‘欧洲中心论’和‘亚洲中心论’的观点来对待世界文化——历史过程的看法是毫无道理的。企图把亚洲政治史上和文化史上的领导作用仅仅归诸于亚洲某个民族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请原谅我打断您的话，我只想提一下，在这方面，您很清楚，最近中国发表了形形色色的考古‘研究’的许多资料，依您看，这种对考古学异常广泛的兴趣是什么东西引起的？”

“在我看来，现在中国特别注意考古，其主要原因是毛主义分子企图‘科学地’论证一个神话，说中国在古代统治了几乎整个东亚。考古学被毛主义分子首先当作政治工具来利用。而且考古学是伪造的。因为现在根据近来的考古发掘所作的结论，一点也不符合实际事实。

“全世界都很熟悉中国的几个最大的考古学家的名字。例如，我们知道裴文中，他曾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洞穴轰动一时地发掘

中国猿人；还有研究新石器时代的吴达，以及其他许多人。但是，现在这些名字都在中国科学出版物中消声匿迹了。通常看到的只是那些背叛中国科学进步传统的人的名字，例如郭沫若。”

“八十岁的郭的姓名摆在各种反科学的胡说八道之下。他的新‘探索’是明显地脱离真正科学的事实的，实质上是在企图争得毛主义的上层人物的好感，企图停留在现今中国内部政治生活激烈斗争表面的欲望驱使下进行的。因此，我觉得郭沫若从前作为中国古代史学家的威望，现在已经给败坏了。”

“郭沫若的投机‘创作’，可以以科学院《考古》杂志上他的一篇叫《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的文章为标本。这篇文章的开头是很简单的，我不妨说，是在对卜天寿这个十二岁的孩子抄录孔子经典著作《论语》时写的幼稚的错别字作语文学的分析。”

“请详细一点谈谈这篇文章吧。如果这是语文学的论文，那么为什么把它放在考古学杂志上呢？”

“虽然它是一篇文字考证的论文，当然也可以登在考古学杂志上，因为抄本是一九六九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附近发掘的墓葬中出土的。但重要的是什么呢？郭沫若的文章中根本没有该墓葬其它出土物的确切资料。他只是局限于对抄本作语文学的分析，但突然间却完全出人意料地作出了根据整个上文无论如何也无法得出的结论。

“主要结论是说唐朝时候（618—907年）在新疆存在汉语学校。他论证的路子大致是这样的：因为墓葬出土汉文写本，说明这些地区在当时就是以汉语占统治地位的，设有汉语学校。因为写本错误百出，文法不通，说明这孩子‘并不是豪门子弟’，而是普通家庭出身，属于‘居民的广大阶层’。根据这一点又引出一个结论，说那里组成‘居民的广大阶层’的是中国人！这样一来，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从远古时代起就住着汉

人，而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等等现今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民族，那都是‘异族’。

“这个结论根本没有证据，也不可能有什么证据，因为根据那篇文章的资料是得不出这种结论的。依我看，它纯粹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写出来的。

“其次，郭沫若的文章还有一个奇怪的特点，这就是冲着苏联学者、苏联科学进行咒骂。我甚至认为郭沫若在其暮年的确损害了人格，现在已准不惜一切来保住由于他背弃马克思主义、背弃科学社会主义而由现今北京领导人赏给他的地位和许多封号。否则，很难解释在语文学的分析和他的文章中的一些话（例如‘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官僚和学者’，‘所谓汉学专家’）之间的联系。”

“您能否谈谈您所领导的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史学语文学与哲学研究所现在进行的工作？”

“我们的考古工作正在广泛地进行着，从新西伯利亚甚至从巴拉宾斯克开始，直至滨海地区的纳霍德卡城。这些工作首次包括了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整个古代史和文化。此外，正有一项也非常重要，那就是我们同蒙古考古学家的共同工作，苏联科学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之间的合作。”

“你们的研究所具体同谁合作？”

“同以施·纳札格多尔什院士为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我们特别满意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院长勃·施连德勃院士对我们的共同工作所给予的巨大帮助。我们在蒙古的戈壁沙漠、西部和东部地区进行工作。

“去年秋天我们研究所在滨海地区纳霍德卡城附近进行了发掘。这些发掘有什么出色之处呢？那就是在我们面前展现了远东地区上古农业的图画。应当认为，农业居址、完整的农村，早在公元前二千年代甚至有可能是三千年代即已存在。而这一点是非常

重要的。因为过去总认为那些地区只有猎人和渔人。突然间我们在这里发现了独立的农业文化。然而恰好在蒙古也有类似的研究。这样便查明了石器时代在远东地区和蒙古都住有农人。这些研究更重要的是，过去总是把蒙古看成一个游牧地区。远东地区和蒙古的工作却能互相印证。

“有一种提法我认为是很生动而又很能说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的本质，就是‘文化的主权’，即文化的独立性。不过，这当然不排斥文化的互相影响和民族间的接触。

“过去，甚至有时候现在也是这样，在我们的科学中，更不消说西方的科学，只是片面地强调黄河的农业居民，中国的农业居民对邻近各族的影响。而现在已经查明，当时存在互相影响，并且大量的进步因素曾由蒙古和其它地区的草原民族以及阿穆尔河流域各族传入于古代中国农业居民的文化。

“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坚决反对那种为了自己实用主义的目的而离开真正科学的毛主义分子所奉行的对世界历史采取大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观点。”

(译自苏联《新时代》周刊 1972年第25期)

远东考古的新发现

阿·巴·奥克拉德尼科夫

远东，这片起自阿穆尔河上游迄于太平洋、起自蒙古草原迄于太平洋岛屿世界的亚洲北部的辽阔大地，很久以来就吸引着研究亚洲大陆这一地区为数众多的操不同语言的诸族历史的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的注意力。

由于绝大多数远东民族（广义的民族，即族）或没有本身用文字记载的历史，没有文字，或曾有过文字（渤海人、女真人、契丹人），但是只保存了片断，有的则随着这些民族的迁走而湮灭了，因而考古学就占有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在此，考古学有权利做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的或唯一的史料，而且这种史料是完全可靠的，因为它一般地属于具体的某一段时期，没有遭到后来的改动，而文字史料，例如带有后期抄录者和编纂者加工痕迹的编年史，却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形。

考古学史料特殊的珍贵性还在于它使我们可以深究远古的时代，这是受文献史料年代范围限制的史学家做不到的事。

可以大胆地说，今后随着远东早期史研究工作的不断展开，随着我们关于历史科学这个部门的知识日益充分，它将愈来愈大地引起研究者和广大读者的注意，我国远东和它接壤的亚洲东部和中部各国诸民族历史的基本问题以及直到澳洲甚至美洲大陆为止的更遥远的地域内的诸民族历史的基本问题，将引起愈益热烈的讨论。

往往可以见到这样的情形：一些观点和发现象爆炸似地突然闪现。在我国远东或比方在戈壁沙漠发现的一些乍看无关紧要的零碎事实，却能够导致往往竟是意想不到的新结论，导致对历史科学的未知领域进行新的探索，导致新的假说。不算太久以前，H. X. 纳尔逊（P. Ч. 安竹思率领的著名的亚洲中部考古队的成员）在蒙古新石器时代居址发现石核（命名为“戈壁式”石核）就是一例。

后来，当这种独特的器物被发现于阿拉斯加的时候，纳尔逊便从中找到了解决“最初的美洲人”即古印地安人部落人居美洲大陆问题的关键。古印地安人部落的祖先由亚洲中部出发，越过白令海峡，人居于原先荒无人迹的新大陆。

当然，要把这些象流水一样不断涌现的科学情报以及在研究者视野中出现的纷芸复杂的事、见解或观点都弄清楚，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必须从其中挑出一些带有关键性的基本题目和问题，通过对它们的考察便可以最省力地阐明我们所研究的这个区域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切主要的、最本质的、最有代表性的东西。

为此，本文试图对远东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方面各项最重要的新发现做一总结并从理论上加以说明。

文明的起源

我们苏维埃历史科学在苏联远东诸民族远古史研究方面究竟取得了哪些基本成绩？

开头第一步就是大量扩充文献史料的基础，广泛开展田野考察工作，从而收集了经过认真科学鉴定的丰富的实物资料。

考察工作进行得最多的自然是在苏维埃时代，是在远东南部的阿穆尔河、乌苏里江、滨海等地区。其中有一九三五年在 B. Г.

唐一波戈拉兹倡议下派往阿穆尔河下游的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第一个专业考古工作队，这是阿穆尔河流域考古研究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一九三五年的考古工作队并没有带回列宁格勒诸如古爱斯基摩型的华美的骨雕之类的珍品，应当说，这使波戈拉兹有点失望。但是，这个队发现并记录了几十处前所未知的古代居址，并且根据在那里收集到的大量资料做出了若干重要的一般性结论。

主要的结论是：阿穆尔河下游的古代文化具有鲜明的独特性。第二个同样重要的而且完全出人意料的结论就是：阿穆尔河下游远古文化（新石器时代文化）显出与阿穆尔河部落（那乃人〔译注：即赫哲人〕、尼夫赫人、乌里奇人）的现代民族学文化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真正“亲密”的关系，这是谁也想不到的事！

这样就查出了，几千年来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正是这些民族的祖先，而不是别的什么民族的祖先。他们曾经创造出当时高度发达的不亚于东亚、北亚其他民族著名文化的本地文化。

稍晚，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一年，在阿穆尔河上、中游从斯列田斯克起到布拉戈维申斯克（译注：即海兰泡）止，再加上通往哈巴罗夫斯克〔译注：即伯力〕方向的一段，进行了广泛的田野工作，包括一系列大型遗迹的发掘。与此同时，在阿穆尔河左岸最大的支流结雅河河谷也进行了甚至更紧张的考古工作。结雅河及其支流曾是哥萨克部队从雅库特来到阿穆尔河地区的主要通道。

同时，从一九五三年起也展开了对滨海边疆区境内（南起朝鲜边界线北至捷丘贺〔译注：或译帖提尤贺，汉语“野猪河”的畸变〕，包括该边疆区南部全境和北部的一部分）的考古遗存的有系统的研究。应当补充一句，那几年的考古工作也包括了萨哈林岛（译注：即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继之，考古研究扩展到鄂霍茨克海岸马加丹附近及马加丹迤北。在楚科奇、科累马及堪察加等地进行了更为紧张的工作，邻近的雅库特情形也是如此。

光是以上开列的地区名单就给人以海阔天空的印象，考古学家好象突然走进了一个未曾经历而引人入胜的古代文化和古代民族的世界。而那些考古发现的本身，那一幅通过考古发掘得以恢复的历史图景同样是宏伟动人的。

仅就远东的阿穆尔河流域和滨海本身而言，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有关人类史的开端，有关人类在远东的最初足迹的那些事实。

自有考古研究以来，远东考古地图上最重大的空白就是没有旧石器时代遗存。

从一八七一年伊尔库茨克军医院附近发现西伯利亚第一个旧石器遗址算起，安加拉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遗存为人所知已经有一百年。稍晚，叶尼塞河上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有旧石器出土，随后在色楞格河以及勒拿河流域也有旧石器发现。在比较晚近的时期，一九四九年，在亚洲中部的蒙古腹地（乌兰巴托市土拉地方；蒙古人民共和国东部；南部，即戈壁；西部，即蒙古阿尔泰地区）发现了毋容争辩的旧石器遗存。

旧石器时代以亚洲东部最古老的周口店及鄂尔多斯出土物为代表。然而和北亚这些地区最靠近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活动遗迹，过去在远东却没有发现。

现在我们终于掌握了阿穆尔河中游的极有价值的旧石器时代遗存。这首先是费利莫施卡村原始砾石工具发现地。这些石器的加工技术以及器形如此原始而古拙，以至可以归属于石器时代技术的开始阶段。石英砾石在一端仅有一个唯一的打痕，形成粗糙的有缺口的刃部，和这类工具（刮削器的母型）一起还发现具有同样缺口的砾石，但缺口位于两侧，彼此相对。这种粗陋工具的缺口之间有一个好象“小鼻子”的突出部。

在另外两个明显的下旧石器发现地，也发现了与费利莫施卡

出土的一模一样的带“小鼻子”的砾石工具，即刮削器状的厚重器物——砍砸器以及打制后所剩的砾石块(石核)。头一个发现地是阿穆尔河边的库马拉村。其二是结雅河边的乌斯奇一图地方，位于同名村庄的下水方向。这样，在远东便突然发现了一个在类型学方面以砾石器物为特征的新的下旧石器时代文化区。

广泛采用砾石制作劳动工具的石器加工技术；生产这类工具时的极度省力；砍砸器状的粗陋砍伐工具及由这些砾石打出的石核等工具类型——这些特点的总和，不仅构成一个特定的统一体，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而且还显示出与亚洲、非洲和欧洲下旧石器时代普遍流行的砾石器体系有着惊人的相似点。如东南亚（柬埔寨）、非洲（奥杜威）和中欧的下旧石器遗存都属于此类。

这些发现物不仅对于远东而且对于邻近的亚洲各地区都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有了这些发现，现代人的祖先对于亚洲大陆内地以及大陆东隅最初的开发过程，便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我们眼前了。如果早先可以以为，古人（尼安德特人的先辈）向亚洲内陆的移动停止于中国北部的周口店，那么，现在已有根据来重新考虑这个传统的观念。

除结雅河及阿穆尔河的发现物以外，古老的砾石文化在阿尔泰（乌拉一林卡）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东部地区（沙音山达）同样出人意料的发现，也可以证明上述的看法。

由此可见，人类的形成及其对地球的最初开发的伟大过程并不局限于中国的东部，而是包括了在几十万年以前的下旧石器时代就已不是无人荒原的亚洲北部和中部的上述区域。

这些真正原始的远东最初居民的创造性活动，在上述基地上，继续发扬光大，呈现出更加宽广的、可以说更加动人的远景。

这里所指的是在同一地域内发现的另一些也很有特色的石器时代遗存。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表明石器加工技术（这是旧石器时